

苏联的社会化农业

计划和結果

上 卷

(供内部参考)

苏联的社会化农业

计划和結果

上 卷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請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苏联的社会化农业

計劃和結果

下 卷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請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供内部参考)

苏联的社会化农业

计划和结果

上下卷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复兴门外翠微路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107号)

京华印书局印装

统一书号: 4017·113

1965年9月初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6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605,000字

印张 26 3/16

印数 1—1,500册

定价(9)3.40元

出版說明

本书是美国资产阶级学者瑙姆·賈斯尼 (Naum Jasny) 受斯坦福大学粮食研究所的委托而写的, 于 1949 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

中譯本分上下卷, 上卷是于树生同志翻譯的, 下卷是薛蕃康同志翻譯的。由于時間仓促, 并限于水平, 譯文和譯名虽已尽量注意正确和統一, 仍可能有疏忽錯誤之处。个别附注系中譯者所加, 仅供讀者参考。

商务印书館資料室

1965 年 8 月

目 录

所长序言	3
志謝	5
第一章 导言	7
第一篇 概論	24
第二章 社会化运动和收购制度	24
第三章 社会化的农場	43
第四章 生产和收入：指标和結果	61
第五章 上市量和消費量	76
第二篇 背景	101
第六章 天然資源和人口	101
第七章 土地占有制和农民的階級分化	128
第八章 集体化以前的农民耕作	155
第九章 革命前的收入和生產	178
第十章 革命后农业生产的降低和恢复	195
第三篇 社会化的組織和管理	231
第十一章 国营农場	231
第十二章 机器拖拉機站	268
第十三章 早期的集体农庄和集体化大运动	296
第十四章 集体农庄：組織	328
第十五章 集体农庄：被集体化的財產和經營情况	341
第十六章 交售任务和集体农庄市場	368
第十七章 人力：利用	395
第十八章 人力：生产力	423
第四篇 社会主义化生产：計划和結果	459
第十九章 机械化	459

第二十章 除机械化以外的其他技术	495
第二十一章 作物总生产	514
第二十二章 谷物	546
第二十三章 技术作物	577
第二十四章 馬鈴薯、蔬菜和水果	605
第二十五章 飼料	625
第二十六章 家畜	639
第二十七章 畜产品	657
第五篇 总生产和收入	675
第二十八章 总生产	675
第二十九章 集体农庄出产的分配和集体农庄庄員的收入	702
附录	727
一、1928 年至 1939 年从事农业的人口	727
二、投資	733
三、貨車、汽車和拖拉机的“不变的 1926—1927 年度价格”	737
四、新經濟政策时期的农业合作社	741
五、新經濟政策时期的預购合同	743
六、非黑土区的小麦	744
七、估計收获量的方法	745
八、确定 1933—1939 年的谷物实际收获量	759
九、谷物收获率和其他主要作物收获率的比較	770
十、特定时期和年份谷物的利用	773
十一、面包和面粉間的价格差額	786
十二、阿尔泰边区的甜菜	788
十三、1939 至 1941 年家畜数目	789
十四、为获得可供出售和农村家庭消费的产品值从农产总值 (照苏联的解释)中减除的项目	792
十五、非农业材料的折旧和支出	794
图表附录	799
人名对照表	831

所 长 序 言

社会化的农业是怎样经营的？社会化农业的组织、管理、产量、劳动生产力和产品分配的情况怎样？要对这些重大问题作出任何一般性的或者确定的答案，时机尚未成熟；可是苏联的经验提供了一种值得注意的机会，借此可以探索特别有关这种经验的一些局部的和假定性的答案。

苏联发言人那种典型的热烈歌颂，不时地被 1946 年那样的全盘否定的责难和特殊的攻击所打断，从访问苏联的记者、其他的外国客人以及最近来自苏联的亡命者，带来大不相同的答案。最初的偏见、党派的关系、观察的范围不同、以及对新事物是否容易相信和理解能力的悬殊，是这些不同看法所以产生的原因。这一问题需要巧妙的和深入的研究，最大限度地利用苏联政策容许国内和国外人们得到的那些虽不充分但也可观的资料。本书所体现的就是这种研究。

本书作者賈斯尼在俄国居住到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中，他作为全俄城市联盟经济部门的一个工作人员，研究了粮食问题。在 1917 年 2—10 月的克伦斯基政权下，他是最高粮食委员会的准委员和最高经济委员会的顾问。后来他在西欧为苏维埃政府服务，作为驻德贸易代表团的谷物专家。在官方出版的《苏联出口商品大全》（用俄文出版，柏林，1926 年第一版，1928 年第二版）中，他编写了很长一段关于“谷物”的材料，其中一大部分是他自己写的。

他居住在德国的最后几年中，以国外通讯员的身分为粮食研

究所服务，撰写一些关于德国和苏联的谷物发展的资料。自从他1933年来到美国以后，他为本所写了兩項小麦专题研究論文——《德国的小麦問題和政策》（1936年11月）和《古羅馬的小麦价格和制粉費用》（1944年3月）——和《各种谷物之間的竞争》（1940年1月）一书。他对拖拉机的研究，以及比較晚近的，对古代小麦、面粉和面包的了解，也有重要的貢獻。我們根据相处差不多二十年的情况，认为他是一位严谨的、天才而可靠的学者。

在协助作者完成这一极艰巨的任务上，本所曾尽了最大的努力。誠如作者本人在《导言》里所說的，我們不可能期待任何人在任何地方能完全說明苏維埃农业制度的发展和結果的真相。在这样的作品中事实和理解总不免有一些錯誤，我們希望今后的研究会对书中可能錯誤的地方加以糾正。可是我們感到滿意的是本书对于正确了解一个非常重要但是向来不明了和混乱的問題，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在本书的編印过程中，本所曾获得洛克菲勒基金的大力資助。

J. S. 戴維斯

1949年7月

志 謝

本书和讀者见面时，彻底研究苏維埃經濟的必要性将已不需要再加强調。而在 1946 年初，粮食研究所决定襄助我进行研究計劃时，情况却不同。如果有人认为此項研究有任何成績的話，一部分應該归功于研究所和行政所长貝奈特博士。

研究所的斯坦萊·金先生在研究工作上尽了很大的力，他仔細閱讀全部草稿，并审核数字，推敲論証等等。很多最后的措辞是出于他的手笔。图表和地图全是他画的。

最初提出的初稿分为两篇。后来根据戴維斯博士的建議，又把材料重新安排，分为五篇。許多其他的改进也是他审核后的結果。

蒂莫欣科博士，对旧俄国和苏維埃农业富有研究的第一流学者，不辞辛苦地把稿本从头至尾讀了一遍。这样的一位专家的建議，当然使原稿受益不浅。

这一研究事項，和我的大多数其他研究事項一样，主要地是根据美国农业部图书馆里的材料。可是，在繁重的工作完成以后，人們想起的不是在那里所用的书籍；而是那里的友好气氛。姓名无法列举；人太多了。可是处处地方——閱覽室、借书处、目录部——一个个人都肯帮忙，那种乐于帮忙的态度使我到那里去、呆在那里，完全感到愉快。

賈斯尼

第一章 导言

苏联农业的社会化是一种独特的现象。国家幅員之大以及农业社会化經歷時間之短，使得对苏联經驗的研究特別引人兴趣。全世界总的說来，由一戶經營的一般田地已經証明是农业生产最經濟的方式。然而数以千計的国有农場——苏維埃国营农場——在苏联創立起来了。这些农場，最初是在生产单一商品（例如小麦、牛、或者猪）的工厂式的基础上經營的，至今在很大的程度上仍然保持着这一特征。再則，在苏联以外的其他地方，人們想要把小农田地合并为大规模生产合作社的企图，到目前为止，在抵抗家庭田庄的侵蝕方面，甚至还不如大农場成功。然而在苏联，差不多一夜之間，就有二千万戶左右的小农田地被合并为将近二十万个集体的农場——集体农庄。

那两千万农户，只有簡陋的生产資料和有限的技术知識，确实是一个爭取迅速进步的經濟中的薄弱部分。需要改进，是沒有問題的。不过他們选择的方法——用国营农場和集体农庄来代替落后的小农耕作制度——是不是比习惯的方法优越；在这新的方法下，是不是农人一定会获得大量的技术知識，获得貸款以便按低廉的价格购买生产資料，以及最重要的，是不是一定能得到迅速扩张的市場，可以按有利的价格售出他們的产物呢？

这种研究的目的

1945年初，作者开始这一項研究工作时，本来希望有助于解答大规模国营农場和集体化农民耕作的相对利益問題。然而，就

集体化的农业经营来说，当调查研究逐渐使真相澄清时，这种希望减少了。在苏联集体耕作是在非常不利的情况下开始实行和发展的，以致即使它本来是一种完全合理的事業，也一定会失敗。我們根据苏联經驗所能得到的唯一結論是，农业的社会化决不該用苏联所采取的方法来尝试。

集体化进行太快，以及国家以过低的价格收购集体农庄的大部分产品，是两项主要因素，使得苏联在集体化方面的經驗不能成为一种正确的适当的尝试。第一项因素的不幸后果，到三十年代末期已經大部分克服，虽然不是完全克服。然而，第二项不利条件始終存在；实际上，随着国家对集体农庄的经营和出产加强掌握，其不利的影响跟着增加。至于国营农場，只有建立时的过分匆促妨碍了它們的发展。有关方面曾尽量給它們机会来消除因此而起的缺点，可是无效。

假如研究的目的仅仅是评价国营农場和集体农庄作为农业社会化的一种实验的作用，那就一定要把大量篇幅用在国营农場方面。实际上，我們的分析主要地集中于集体农庄。这一研究的主要目的，不是討論社会化农业的优越性那种理論問題，而是分析作为国民經济中一个极重要环节和以空前速度进行工业化的基础的苏联农业的发展。由于社会化运动开始以后不多几年，国营农場就被降到苏联农业中次要的地位，关于这方面叙說不妨从簡，以节省篇幅。

尽管工业和城市地区扩张很快，苏联人口中差不多三分之二仍然是在农村。苏联工业在国外市場上銷售产品，显示不出巨大的竞争能力。苏联不得不完全依靠农业来取得全部食粮和几乎是全部的农产的工业原料。苏联农业现在仍然是国家經济結構的基础，并且至少在很长的时期內，将继续是这样。苏联巨大的改造运

动的成功，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农业改造的结果。农业的基础倘若失败，工业的上层建筑，不管本身怎样坚强，将跟着农业一起垮掉。

这一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仔细地分析，作为苏联经济的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的苏联农业，特别是要分析社会化运动中以及运动以来的苏联农业的情况。这样的一种分析，我们迫切需要，因为苏联在世界大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实行农业社会化的地区越来越广，这样的分析更加重要。国营农场和集体化耕作制度在波罗的海国家和其他最近取得的地区中将被采用，当然是无可避免的。可是集体化耕作制度甚至已经成为一种输出品，正在被移植到更西面的苏联特殊势力地带。

研究的途径

一般地关于伟大的苏维埃改组运动以及特殊地关于小农耕作的集体化，人们已经写了很多的东西。各种评价不同，有的热烈地赞成，有的预言新制度将完全失败，其中极端的见解占绝大多数。本书作者不能否认他有自己的评价，可是这里的研究不是为了说明那种评价。不如说，研究的目的是要给读者一个机会来形成各人自己的意见。要能合理地做到这一点，人们需要一切有关的事实和数字——特别是经过批判地考查和选择的数字。作者竭力收集的就是这种事实和数字。

思想和哲学在 1917 年后的俄国农业改组中起了重要作用。俄国农民的概念——认为土地是上帝的，只有那些愿意亲自在土地上劳作以及需要土地的出产的人，才可以占有土地——在 1917 年的农业革命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影响了农业革命以来农民的行动，并且在未来的长时期中将继续发生影响。同样地，大规模国营农

場的建立以及小农耕作的集体化，無疑地是馬克思主义思想的产物，馬克思认为大规模耕作比小规模耕作优越得多，正如大规模工业比小规模工业优越一样。这是一切不同程度的共产主义者以及实际上許多社会主义者繼續坚持的一种看法。关于农业或者牵涉到农业的种种哲学，也在党内斗争中起了很大作用（一方面是斯大林主义者，另一方面是托洛茨基派和右翼分子）。这些思想和斗争的结果很清楚地反映在政府的行动中，特别是在集体化以前和集体化初期。

各种哲学和思想尽管重要，我們的研究中用在这方面的篇幅却很少，差不多完全不談論党内斗争。不管指导原則是什么，結果已經或者証明了这些原則是正确的，或者証明了它們是錯誤的。作者所关心的主要是这些結果。

研究中的困难

研究一般的改組运动和农业方面的社会化运动，有許多困难和障碍。第一种困难起因于这些运动进行时的不正常的情况。有意識的隱蔽資料和曲解基本統計，更給研究者带来困难。

剧烈的和混乱的变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期国营农場的大扩张，特別是 1928—1932 年的集体化运动，完全成为一陣突然的打击，犹如冰雪崩墜一般。国营农場的建立和經營，由于干部缺乏基本知識，例如不懂得母牛或母猪必須飼养和使其繁殖这一类的道理，而受到重大損失。集体农庄同样地处于不利地位，可是其他困难更阻碍了它們的进步。不仅农民是被迫加入集体农庄的，而且这样做的方法很不公道，总的來說，也不經濟。虽然集体农庄的目的本来不是为那些被集体化的农民的利益服务，新的集体农庄的成員却必須在交出其他生产資料的同时，也交出他們的全部

耕畜和一部分生产家畜。农民們不遵照办理，而把家畜卖掉、吃掉或者毁掉，甚至对馬匹也如此，在整个苏联，家畜的数目从1928年的三千三百五十万头降到1933年的一千六百六十万头。在这样短的时期內，不可能获得多少机械动力。这样，集体化經濟不但未能按預定計劃建立在机械动力的基础上，而且好多年中由于任何牵引力都非常缺乏，而受到損失。

集体化运动毫无計劃地搞了好多年，甚至对于集体农庄里工作應該怎样組織，也沒有一个明确的概念。现在，集体农庄里劳动組織的基本原則是每个集体农庄庄員对指定的任务个人負責，以及組織生产小队来执行特殊工作或者照管一定数目的家畜，然而，这些原則只是逐漸地变成实践，直到差不多每个农民都已經成为集体农庄庄員以后，才普遍实行。生产小队，作为集体（以及国营）农場中劳动組織的标准形式之一，到1939年才建立。起初，集体农庄庄員（集体化的农民和他們的家属）只是庞大的一堆群众；他們的领导人大多数沒有經驗，其中許多是从城市工人队伍里抽調出来的。

在集体化运动的最初几年，土地耕种得非常之差，以致杂草滋蔓，成为一个严重問題。1941年战事发生时，这一缺点还没有完全消除。此外，在某些重要地区，家畜的大量减少也是到那时候才弥补起来的。

到1939年，集体农庄建立时所采取的方式方法的初期影响还没有完全克服，集体化可能提供的有利条件还没有充分發揮。同样地，像苏联这样組織的集体农业的內在的消极特征，也沒有发展到最大的程度。換句話說，伟大的計劃还没有开花結果。苏联在1941年中部才积极卷入战争，但是第三个五年計劃（1938—1942年）的完成，却因1939年中部以后加紧战争准备而受到一定程度

的影响。由于巨大的战争破坏，不正常的情況可能会继续存在好多年。因此，社会化农业和它的結果，必須在一种动的或者迅速变化的状态中来分析。单是这一点就会使研究工作困难，即令我們有可靠的、沒有偏見的統計資料。

隱蔽真相——可能似乎使人觉得奇怪，旧俄国也許曾經以它的农业統計而自豪。統計工作在沙皇时代确实盛极一时——在中央政府的机关中范围很小，可是主要地在各省政府的統計机关里盛行。俄国知識分子中最有才能的人，在沙皇时代沒有机会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往往在这些統計机关里逃避现实。省政府的統計几乎完全是农业的，或者至少是农村的。省政府有它們自己的农作物数字，和一套正式的官方統計大不相同（參閱下卷，附录七）。省政府的統計人員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开始研究农民生活的各方面，此后大规模地經常进行研究。^① 这些研究的一项特色，對我們現在的研究有特別意义的，是他們包括消費方面的資料，虽然一般地只列出谷物消費的数字。有了这些消費方面的資料，他們編出約略的谷物余額，据以預測一些特殊地区中可能出現的剩余和不足，以及核對生产統計。

革命使得省政府的統計家有机会把他們的活动扩展到全国范围。这里只举出几个名字：波波夫，原土拉省統計主任，后任中央統計局局长；格罗曼，原梁贊省地方自治局統計主任，后任国家計劃委员会的首席經濟学家；康德拉季耶夫，原各省地方自治局协会經濟部研究人員，由于在“长期循环”方面的著作而聞名国际，后来成为商业研究所所长。

1921—1929 年这一段时期确实是苏維埃統計的黄金时代。中

① 沃依岑斯基：《世界农业統計的进步》，见《农业經濟学月刊》1939 年 11 月，第 21 期，第 777—778 頁。